



“明堂月令”发生考论*

管宗昌

摘要:从明堂月令的发生入手是解决明堂及月令相关问题的重要法门。考古发现表明,早期宫殿建筑并不存在工整的“亚”形结构,而是稳定呈现出以坐北主殿为核心的“北主四合形态”,早期文献中关于明堂的记载正是这一建筑形态的折射和反映。后来典型的“亚”形明堂的构想,须待其所属的建筑系统与月令体系、五行体系三方的深度融合。五行观在融入传统的“四时-四方”系统时曾出现“土”位难以安置、时空配属扞格等问题,其生克观所承载的平等观念与“中央”的统领性之间也期待配属调适。三大系统的初期融合是在《管子·幼官》中实现的。它通过虚构一个位于“中央”的“五和时节”,实现五行系统对月令系统的完全融入;通过“图方中”使“中央土”在五行系统的融入中重获统领地位。当然,《幼官》又赋予“图北方”以特殊地位,形成独特的“双中心”模式,体现出北主四合形态的顽强遗存。五行观的介入是推动明堂月令发生的关键,五行介入后明堂被重构为规整的礼仪空间,月令实现王官化改造。

关键词:明堂月令;五行系统;“亚”形结构;《管子·幼官》;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2-0095-11

明堂和月令的相关研究悠久而复杂,从明堂月令的发生入手将是破解相关谜题的重要法门。“明堂月令”的称谓至汉代已较为广泛。蔡邕专文《月令篇名》释名:“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褻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1]明堂与月令的连名借重了明堂的权威,凸显了月令的王政功能。同时,明堂又因这一连名而蔚然大观,月令也因之而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①。

自汉代蔡邕、郑玄以降,关于明堂的争论不绝。王国维指出:“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2]古人对明堂的讨论主要围绕明堂创立的时间、(周人)明堂有无、明堂的性质

与功能、明堂形制等问题展开。研究成果繁复、成就非凡,尤其对明堂性质的探讨,涉及范围极广。然而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缺乏考古资料的支撑,仅据文献和想象;对明堂形制“后入为主”,缺少发生学分析。从蔡邕、郑玄始,均将其认定为中央(太室)加四方工整合围的“亚”形结构,但这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以及汉代明堂的典型形态,而非早期发生形态。

明堂的早期形制与明堂的发生仍然是当前明堂研究的焦点。现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进展,集中表现为对一个关键问题的初步聚焦,即明堂月令^②。学者已认识到明堂与月令的深刻关联,以及明堂月令对于探讨相关问题的关键意义。但目前学界对古宫室形制仍存在简单化认知,对古代建筑基址的认知

收稿日期:2025-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管子》的生命理念与文章书写研究”(21BZW189)。

作者简介:管宗昌,男,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汕头 515063),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诸子学研究。

有待提升;对明堂月令缺乏发生学的细致梳理。月令研究同样积累了大量成果,其中月令源流考辨是重要内容,主要集中于《礼记·月令》的成书年代和文献源流问题上,曾有“周公说”“出于《吕氏春秋》说”“夏代说”“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说”等^{[3]501-512}。但这些研究多受经学思潮影响,难免悖误。近年研究越来越关注阴阳五行学说在月令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美东明确提出月令是阴阳家的作品^③,林甸甸也注意到阴阳学说之于《月令》的意义^④等。这些都是对月令源流的有益探索,但研究还不够充分。月令源流既要关注《礼记·月令》,同时也需要从整个月令系统上考察,这同样指向了与阴阳五行密切相关的明堂月令的发生。

从发生学上探讨明堂月令的发生,有助于上述明堂和月令诸问题的推进。而要更好地呈现明堂月令的发生,则必须进行三位一体的还原,即以现实古建筑的真实形态为参考,紧密结合早期文献记载,还原文献本义,贯穿各大文化系统的发展脉络,呈现明堂月令的真实发生。

一、早期建筑形态与早期明堂描写

20世纪中叶以来,大量上古宫室基址考古发现为认识早期朝堂建筑形态提供了现实依据,现代学者已将其运用于明堂研究。但是对它们的认知却较为粗泛,普遍将其笼统描述为“亚”形结构,缺乏具体真实的描绘。这种认知对早期明堂认知未能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只能对陈陈相因的“亚”形明堂认识形成所谓的对证,掩盖了明堂月令的真实发生。所以,有必要重新检视上古时期宫室建筑的真实形态,现选取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基址进行分析。

第一,秦安大地湾建筑基址F901也被学者们称为“大房子”,是先夏宫室的代表。“F901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侧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左右对称;主室后面以主室后墙和延伸的侧墙又构成单独的后室;主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F901的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群体。整个建筑坐北面南,正门的门向是南偏西30度。”^⑤钟晓青认为:“在东西侧室及后室中都

未发现外墙,称之为‘室’是不大合适的。”^[4]这一信息至关重要,发掘报告并未显示合围的外围墙,这就意味着东、西、北三面附属建筑可能不是合围屋室,而是只有两边墙、上有覆顶的敞开式建筑。关于主体建筑前的三列柱基,刘叙杰指出:“前部有与主体空间等宽的三列柱迹,表明前部连接一敞篷。”^{[5]85}这里极可能是柱撑的敞篷,至于是否与主体连接不好判断,但可以确定与其他三面附属建筑形态不同。要言之,这处房址的建筑特征表现为:坐北朝南;主次分明,以坐北长方形主建筑为核心,其余四面属附属建筑;前方大面积敞篷,其他三面为敞开式连接建筑。

第二,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是夏代宫室的代表。这处建筑已经展现出鲜明的院落式形态:“遗址的四边包括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为复廊和大门。北墙和三面廊围成一个广庭。广庭中央偏北是中心殿堂,中心殿堂与北墙之间有一大墓。”^⑥遗址四面合围,其中北面为纯墙体,东西两面只有东侧中部有一小型房屋,其余均是兼具围墙功能的廊庑。南面也是廊庑,但已呈现明显的门塾三间,中间是门道,两侧是两间屋。该遗址的主体建筑显然是坐北的宫殿,它与“大房子”有较大区别,由东西排列的三室组成:“南壁均辟门通檐廊,另东、西并置门达中室。”^{[5]150}从台基柱洞看,应是四面檐廊,已不是“大房子”的四面附属建筑。

第三,偃师商城1号宫室建筑群4号宫殿基址应属商早期建筑。进入商代,建筑形制又有所变化。“正殿朝南,方向188°,基址全系夯土筑成,包括正殿、东庑、西庑、南庑、南门、庭院和西侧门等建筑,自成一体。”^⑦较之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既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又呈现出新的建筑特征。其继承性表现为主殿坐北朝南,总体仍是四围结构;特征表现为围墙形态弱化和三面屋舍功能的强化,呈现坐北主殿与三面屋舍形成的四围屋舍样态。

第四,安阳洹北商城大致属于商中期建筑,其中1号基址虽然东部仍未发掘,但其形制大致清晰:“整个基址的建筑物部分由门塾(包括两个门道)、主殿、主殿旁的廊庑、西配殿、门塾两旁的长廊组成。估计尚未发掘的基址东部还应

有东配殿。”^⑧这较之偃师商城4号宫殿基址稍有变化:南墙基本只突出了门塾这一屋舍建筑,两旁长廊则与二里头遗址相似;东西配殿建筑显示其屋舍功能进一步凸显。

第五,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其使用上限大致在武王灭商之前,下限大致在西周末年。本建筑前堂是建筑群的主体,后有后室,前堂后室之间有小院;东西两侧各有八间厢房,前有门房,后有围墙,形成四围建筑群。发掘者认为它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因为“在西厢房的第二室的窑穴H11中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⑨。王恩田则根据《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也判定其为宗庙^⑩。综合看来,本建筑属宗庙的可能性较大。

第六,陕西扶风云塘建筑遗址被认为是与先秦宫室形制记载最接近的一处。徐良高、王巍根据考古发掘认为:“与已发掘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召陈建筑群相比,云塘F1组建筑群更具有典型性,无疑属于西周高级贵族所使用的建筑。至于其具体的用途性质,可能与家族宗庙有关。”该遗址较之商代四围建筑又有新的形态:四周有墙垣与南面门塾贯通,东西两面的附属建筑则已经完全独立不再具有墙垣功能,而另设独立墙垣。主殿呈“凹”形,内部结构形态较为复杂^⑪。需特别指出的是,此主殿内部虽然复杂,但是并非“中央+四方”工整排列的四合结构(其他早期基址中也没有出现),其大致呈现的仍然是南北轴线的左右对称结构。

第七,秦雍城1号宗庙。其形制显然与云塘宗庙有承继关系,形制也极为相似:“大门、中庭、朝寝及亭台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形成建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配置厢房,左右对称;东、西、南、北四面环以围墙,形成一个全封闭式的建筑群。”学界普遍认为此处遗址是宗庙建筑,建筑年代应该在春秋中期,废弃于春秋晚期^⑫。

第八,秦雍城3号宫室呈现的是春秋战国宫室的另一种形态^⑬,应与凤雏基址存在沿承关系。该基址是由五座庭院沿南北向轴线纵列的一组建筑^{[5]263},第三庭院是主体,学者称为“外朝”,其中只有主殿而无配殿;第五庭院最大,有北、东、西三面殿。单看每个庭院都没有形成四合结构,但总体符合“前朝后寝”的形制。它的

位置在宗庙1号建筑的西侧大约500米处,当属秦国宫室,使用时间大约在春秋到战国时期。

通过对各时期代表性宫室形态的梳理不难发现,学者所言的“亞”形结构或四合结构,其实是极为笼统和模糊的描述。它们只是总体可视为四围结构,远非四面均等而工整的四合结构,独栋建筑内部也没有严整的“亞”形存在。早期宫室大致是这样演变的:先夏时期虽出现过类似独栋建筑的四合形态(其中明显有作为主体的朝南主室),但是后来逐渐演变为院落式四合结构,由坐北的主体建筑和其他三面建筑构成四合庭院形态。三面屋舍功能逐渐凸显,围墙功能逐渐弱化。从凤雏、云塘及雍城建筑看,西周时期朝堂与宗庙逐渐分化,宗庙建筑更倾向于有东西配殿的四面屋舍形态;朝堂则更倾向于多进结构,主体宫殿后面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宫室(后寝),合于“前朝后寝”的形制。

上古宫室演变有迹,形态虽异但核心特征明显:其一,总体呈现以南北为轴线的左右对称形态,坐北的主殿始终是整个建筑群中稳固而核心的存在,历久不变。其二,四合形态均以建筑群形态呈现^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栋四合建筑^⑮。

早期宫室的四合形态都是由作为核心的主殿和其他附属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分有主次,并不呈现为四方工整的“亞”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北主四合形态”。这种现实建筑形态会折射或反映在文献之中,早期明堂文献材料可用以对照。《逸周书·明堂解》^⑯和《考工记》是关于明堂形制的早期记载。先看《逸周书》:

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位,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位,门内之东,北面东上。诸男之位,门内之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南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四塞九采之国,世告至者,应门之外,北而东上。宗周明堂之位

也。^{[6]759-765}

这段文献重在描述诸侯排位、明尊卑次序,但朝会以明堂为地点,其中折射出建筑形态。朝会之中,周公以天子身份坐北朝南,臣属排列展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臣属位于周公面前,三面环绕,突显周公坐北朝南的尊位。文中可见堂前三阶,即中阶、阼阶和西阶,其中诸侯位在“阼阶之东,西面北上”,唐大沛云:“阼阶在东。诸侯位次面西,以北为上。”^{[6]763}诸侯位在主殿台基东侧台阶之东,在周公左前方位。同理,“诸伯”在周公右前方位。据诸侯位在“阼阶之东”判断,他们已经在明堂之下,而不在明堂上,“九夷”则在“东门之外”,应该在整座宫殿的东门之外,仍然在周公的左前方位。薛梦潇曾专门为此绘图,可供参考^⑩。朝会呈现的是周公坐北向南为尊位,诸侯三面而立。

其二,以距离远近展现圈层结构,体现亲疏尊卑。此次明堂朝会的目的在于“明诸侯之尊卑”,以距离远近展现的四大圈层是朝会的核心形态:第一层:三公(正前)—诸侯(左前)—诸伯(右前);第二层:诸子(正前东)—诸男(正前西);第三层:九夷(东门外)—八蛮(南门外)—六戎(西门外)—五狄(北门外);第四层:四塞九采(前方应门外)。第一圈层以正前(南)为尊,东次之,西再次;第二圈层均在正前(南),东次之,西再次;第三圈层对应所来方向无尊卑;第四圈层在正前(南)。可见,臣属排列的基本结构是以周公面前左(东)、中(南)、右(西)为基本范围,尤其是正前方使用频次最高,同一圈层仍以正前(南)为尊。

这次周公朝会折射出的明堂形态,与考古发掘的宫室形态十分吻合,展现的都是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的属性。可以确定,这次朝会绝不是安排在独栋的建筑之内,而是发生在一个建筑群中。坐北的主殿是天子面朝众臣的所在,其他三面的附属建筑则十分黯淡,基本没有反映。坐北朝南的尊位是现实建筑形态(尤其是主殿)在朝会中的投射。薛梦潇将此处的“明堂”认定为“治朝”^⑪,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看《考工记》关于明堂形制的记载: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7]

关于明堂的形制,从郑玄开始就解读为“亞”形结构:“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数。”^[8]在郑玄看来,这一结构与五行观念相表里。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巨大,戴震、阮元、俞樾、焦循、孙诒让、王国维、杨鸿勋等虽然在描述的具体形态上有所差异,有的将四室置于四隅,有的置于四方,但是总体形态都不离“亞”形结构。

其实,这种“亞”形五室与《考工记》所记的明堂形制并不吻合,最明显的不合就在于:工整排列的“亞”形五室最终形成的明堂是东西与南北等长的正方结构,这与记载的“东西九筵,南北七筵”的长方形不符。如果沿着“亞”形结构的思路复原,势必出现各种歧解。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回归文献本身,二是合理结合现实建筑加以对照。

细读文献会发现,《考工记》的这段记载其实并没有太多歧义。其中明确了明堂东西和南北尺寸,分别是九筵和七筵。“度九尺之筵”,则“堂崇一筵”合今制约2米,显然不是指明堂建筑的高度,而是指建筑所在的基址,即明堂建筑在高2米的台基之上。“五室,凡室二筵”很自然承上而来,说的是明堂包含五室。“凡”字是理解这段文献的关键,历代诸家和学者都忽略了对此字的辨析,导致不少误解。“凡”,尹黎云:“甲骨文作……而是槃的象形。槃子的特点是面积大,容物多,是最括众物的形象,故凡字从槃指事,可得‘最括’义。范围‘最括’,引伸有要点、概略义。”^[9]“凡”字的一个重要义项就是大概。扬雄《长杨赋》:“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凡,而客自览其切焉。”颜师古曰:“凡,大指也。”^[10]费振刚等直接将其释为:“大概,概略。”^[11]如此看来,文献的意思极为明确:明堂东西长9筵,其中共有5室,每室自然就是大约2筵。如果每室是准确的2筵,则原文不应有“凡”字。

再从建筑基址看,历代主体宫殿内部东西排列多室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形态,但迄今未

发现在独栋建筑中出现“亞”形结构。如偃师二里头遗址排列三室、岐山凤雏西周基址排列六室等。薛梦潇对历代明堂复原进行了缜密的辨析,并参照齐镇西周建筑基址形态复原,将五室置于明堂北外侧,而不是集中在堂内,东西两侧又各配以房^⑩。她注意到历代复原者先入为主的弊端,积极参照考古发现,摒弃了独栋建筑的“亞”形构想。虽其将五室东西并排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将室置于堂外的做法并不符合齐镇基址实况(基址显示室、房等均位于宫殿之内)。此谬误关键在于没有很好地注意和理解“凡”字所指的“大概”之义,以致对尺寸斤斤计较而无从安置王室的排列。《匠人》中所述“周人明堂”更可能的形制就是独栋建筑之中前堂后室,后室东西并排,每间大约2筵见方。云塘基址所展现的内部结构复杂具体,《考工记》则是概略描述,无法准确还原更多细节。

通过早期基址和文献对照能够看出,早期明堂记载仍是现实建筑形态的反映,所指主要是作为主体建筑的主殿,并没有展现后世那种严整的“亞”形。

二、“四时-四方-五位”模式及其与五行的扞格

早期文献中的明堂形制是早期现实建筑的投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远非工整四合模式。那么,后世所展现出的严整的四合结构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明堂所属的建筑系统与月令系统、五行系统的融合则至关重要,即“明堂月令”的发生。

当前学界对于明堂月令的发生存在简单化的认知。如有学者认为月令系统的四时观念与四方观念密切关联,也就是“四时-四方”系统,建筑系统则依据其“亞”形结构与之自然发生融合^⑪。此种观点忽略了早期建筑以及明堂描写都不是真正“亞”形结构的事实,同时也忽略了明堂月令发生过程中五行观的作用。葛志毅提出:“今日欲恢复上古明堂制度真相,首先必须剥离包装于其上的阴阳五行油彩。”^⑫这一见解可谓卓识。但是他侧重分析五行的介入,对介入之前的发生脉络涉及较少。明堂月令的发生

是建筑系统、月令系统和五行系统三大系统的融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生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月令系统隶属于悠久而稳固的“四时-四方-五位”系统。这个系统展示的是古人时空统一的认知传统,现在可见最早的是古人时空统一的认知传统,现在可见最早的“四时-四方”匹配的资料当是甲骨文所载的四方风,李学勤整理为:“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伏风曰役。”^[12]方、风匹配关系其实就是早期季节概念的雏形。胡厚宣等人认为这段记载足以证明四季观念的萌芽^⑬。四时观念与四方相互匹配体现出鲜明的时空统一特点。方风叙述次序为东、南、西、北,这种起于东方的说法成为文化传统并得以延续。此外,从《尚书·尧典》“二分二至”的记载亦能看到“四时-四方”观念。杨儒宾认为:“四方神实质上也是分至之神……时间和空间在此是统一的。”^[13]¹¹⁶四方和四季相匹配,所叙述的顺序仍然是东、南、西、北,对应的季节为春、夏、秋、冬。这种“四时-四方”对应模式是早期月令书写模式的固有形态。

关于五位(四方加中央)的产生,学界则争论较多。胡厚宣基于四方风认为商代已有五方观念,进而判定五行说起源于此^⑭;但金谷治等学者明确反对此说,认为商代还没有以方位为基础的五行体系,“今天的情况下也还无法承认以甲骨文为首的殷代史料中已有了明显的五行说”^[14]。实际上,目前确实还缺乏殷商存在五方位系统的切实证据,但这并不能否认五方位观念的产生。艾兰就认为五位之于四方是一个自然的认知发生过程:“如果把‘方’作为方形来理解,‘四方’位于东、南、西、北,不可能在方形的土地之内;只能位放一个中央方形之外。这样看,土地就是一个‘亞’形。”^[15]这是从与“四方”相伴而生的角度提出的“中央”概念。当然,从“方”字在殷商时期的内涵分析,同样能得到类似的认识。王爱和认为:“‘方’最常用来形容异族政体,无论是表示一个具体政体的‘某方’,抑或单单是一个‘方’,或者‘多方’。简言之,‘方’与‘我’,即‘大邑商’是相对而言的。”^[16]四方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以我为中心的政治地理观念,所以无论殷商时代的五方位是否已成系统,不可否认的是中央概念是与四方相伴而生、相对而

言的,它和四方相比具有典型的理念化特征,具有超越四方的虚在性和政治属性。

如果说四方和四时天然匹配,那么由四方衍生的五位是如何与四时相匹配的?考察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不难看出其主要依靠“中央”的特殊性实现对四方的统照,同时实现对四时的统照,而且这种和谐共存已然早于甲骨记载。安徽含山凌家滩四号墓(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出土的一件玉片,上有八角形图案。陈久金、张敬国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含山玉片当中恰刻一太阳。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把玉片大圆所分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与季节有关的图形。”^[16]冯时也认为:“明确反映了古人以方位与四时八节的联系。”^[17]玉片明确显示出中央及其之外的四方、八位,这暗示了四方与五位的悠久关联,也暗示出“四时-四方-五位”之间的自然匹配。

在明堂月令的发生过程中,还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五行是后来才参入整个系统的。葛瑞汉曾言明:“这些关联最初是建立在古老的四季和四方系统之上,而五行则是后来才加上的。”^[18]任何过早地将五行观念贯入明堂月令的做法都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谬误和认知偏差,如郑玄将《考工记》中的明堂与五行观念结合,就犯了此类错误。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众说纷纭,但通过文献梳理,仍可对五行观念的早期演变以及“五行”与“四时-四方-五位”的关系进行考察。《尚书·洪范》^[19]中的五行说是现存最早的“五行”文献:“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18]这里着意描述的不是五种物质本身。“行”,师玉梅说:“行的本义是道路。”^[20]五行重在描述五种物质的不同属性,每种物质有不同的属性和发展趋向。杨儒宾认为:“五行之物的本质就是不同性质的‘力’的流动。”^[13]^[40]“五行之物”有类似的意指。所以,五行本义是与属性不同的五种物质相关联的五种不同走向、趋向或规律。《洪范》在本质上规定了五行说的概纳属性,这直接导致后代五行学说对系统化配属的追求。五种物质的

叙述顺序为水、火、木、金、土,不存在生克逻辑,“土”居于最后。

《洪范》五行说对后世文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19]^[564]从五行角度看其排列顺序与《洪范》完全相同,遵循的是相克次序。另外,《逸周书·小开武解》:“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6]^[291]这里,五行与颜色配属,次序仍与《洪范》完全一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19]^[1502]对此,孔颖达曰:“分五行以配四时,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时物之状而为之名。”^[20]此处的句芒等正是时节之神。这是较早将五行与“四时-四方-五位”系统配属,并在次序上主动适应后者,即木、火、金、水。当然,“土”仍被置于末位与《洪范》的做法是一致的。

由上能够看出,春秋以前五行的排列并没有普遍可解的次序^[21],偶尔出现过相克次序,但未出现过相生次序。“五行”在与“四时-四方-五位”配属之后逐渐获得了方位次序,但并没有完全展现“四时-四方-五位”系统中“中”的统领属性,而是延续了将“土”置于末位的做法。这意味着五行参入此系统时,“土”并不能直接且自然地对应“中央”所具有的特殊统领属性,二者融合并不顺利。

无独有偶,“五行”初步介入“四时-四方-五位”系统时的扞格还表现为五行与四时之间的失配现象。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楚帛书是一件图文兼备的月令文献,学界称之为《四时令》或《十二月神图》。《四时令》将一年分为四时十二月,分居四个方位。从首三月(春季)-东方左旋阅读,仍然是“四方-四时”模式^[22]。《四时令》的五位意识并不明显,帛书中间部分是倒转五位的甲篇和乙篇,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中央方位。但《四时令》显然也有五行观念的渗入:乙篇讲到九州不平,山陵崩坠,四神乃作,“捍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2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出现“五木”,但是后文炎帝命令祝融驱使四神“【以】□四敷奠四极”^[24]。也就是说,从帛书图文看,真正支撑的四极是青木、赤

木、白木、墨木,分别位于四隅,唯独没有“黄木”。另外,其四边画有四季神像,杨宽认为这就是乙篇所言的:“长曰青□干,二曰朱□兽,三月蓐黄难,四月□墨干。”^{[3]388}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从五行配属的角度看,西方与黄色显然并不对应。相同的处理方式在《管子·轻重己》中也曾出现。这种处理方式的本质是“四时-四方”与“五行”配属的扞格,牺牲的是五行配属的严整。也就是说,五行观念的确渗入其中,但是“中央-黄”被强势的“四时-四方”观念所湮没,扞格出现时也自然地牺牲五行配属的严整,这是五行与四时失配的典型表现。《墨子·贵义》中“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一段也展现出五行之土无处安置的尴尬。

综上,“四时-四方-五位”系统是一个源远流长且结构稳固的认知框架,其中“中央”凭借其独特的统摄地位,与“四时”“四方”和谐共存。然而,五行观念在早期的介入却并不顺利,两大系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扞格:代表“中央”的“土”未能承袭其统摄地位,“五行”与“四时”之间也屡见无法对应的错位与抵牾。因此,五行与月令系统的融合亟待一个全新的思想契机与体系突破;而作为建筑系统的明堂,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契机。

三、《幼官》的双中心与三股合流

从现有文献看,月令、建筑、五行三大系统的最早融汇是在《管子·幼官》中实现的。

《管子·幼官》主要通过虚构一个位于“中央”的“五和时节”,实现五行系统对月令系统的完全融入。这样,原来的四时实际上也就变为五时,与五行实现融合对接。五行的介入立即显示出强烈的弥漫属性,实现了多个维度的串联:方位-时节-数字-颜色-味道-五声-气-五后-五兽。这是五行第一次与“四时-四方-五位”系统的和谐共融,此系统一改之前将“土”置于末位的做法,而是将“五和时节”置于“图方中”,在篇首首先叙述。这反映的是“中央土”在五行系统的融入中重获了原有的统领地位。

需注意的是,《幼官》明显表现出“中央”和“北方”的双中心模式。一方面将“图方中”置于

首位统领位置,另一方面又以玄宫方位为引导,赋予“图北方”以特殊地位,形成独特的“双中心”模式。

《幼官》“图方中”的中心地位在文章形态上有所展现,同时又和等级观念紧密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现出中央的统摄地位。

首先,从篇幅规模看,“图方中”(中央本图)的字数是东、南、西三方字数的两倍多,只有北方本图的篇幅字数大于中央本图(详细情况见表1)。这点比较特殊,后文将详述。当然,中央和三方(东、南、西)的这种差异一方面与作者的结构理念有关,有意突出中央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可能与图纸形态有关^②。

表1 《幼官》各方图篇幅字数统计表

	中央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本图	386	167	163	158	462
副图	350	136	97	116	240

其次,严整的次序性。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数字序列的规模使用。中央本图大量使用数字化叙述,并展现出鲜明的层次性。有的是依次上升,有的则是依次降低。如“则皇”与之后的“帝、王、霸、众、强、富、治、安”共九个层次,依次降低;紧接下来就是:“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内外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21]184}这里的九举之功依次上升,其九举不能和前面的九个治国层次意义对应,也就是说其使用数字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数字意义,不可斤斤计较于几举具体所指。然后又出现“九本搏大……八分有职……十官饰胜备威……六纪审密……五纪不解”,张佩纶认为“十”当作“七”,是有道理的^{[21]184},这是从九到五依次降低;最后还有“治乱之本三……存亡之数九”,是从三到九依次上升。

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图方中的数字式叙述都十分严整,展现出严格的次序,有时这些数字超越数字意义本身,这也导致历代注家在落实某些数字的具体所指时无所适从。这些数字有时不必也无法落实。次序化数字意义有二:一是以数字式的总结展现丰富的内涵,从而产生纲领指导意义;二是通过数字的严整排列展

现秩序化的存在形态。

最后,句式的整齐化。中央本图的句式十分整齐,一个叙述单元基本都使用统一句式,而且句型以短句子为主。如:“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发之以力,威之以诚。”^{[21]184}这种整齐的短句排比造成经典化语感,产生简洁、权威的文章效果。

《幼官》的“中央-四方”观念,既意味着对中央的特殊化、纲领性书写,同时也意味着等级观念的贯彻与实施,这在中央和四方的书写中都有所透露。如中央本图既明确了以“皇”为最高等次的九个不同层次,也明确了从“九本搏大”的“人主之守”到“五纪不解”的“庶人之守”的等次,其等级区分观念是清晰的。再如“东方本图”有:“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尹注:“强国所以禁御弱国,弱国圈然也。”^{[21]189}“圈”,《大广益会玉篇》云:“牢也。”^[22]“圈”和“属”意义相近而程度有别,“圈”,即指强国为牢笼;弱国则成为附属和从属。相似的表述还有“南方本图”,如“则上尊而下卑,远近不乖”也十分看重强弱统属和贵贱主宰。

所以,《幼官》是以方位统领的五行模式,五位隐含了五行^③。这里的五行观念只有配属意义,没有展现生克理念。方位统领下的“中央-四方”模式使得“图方中”被特殊化处理,具有统领性地位。同时,“中央-四方”模式蕴含的政治等级观念被注入到《幼官》的月令书写之中,使之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突出了中央王权的统领属性。

“北方”在本篇中是特殊的存在,可视为次中心。从篇幅规模及章法上看,它与其他三方差异较大,规模也近于中央本图。

北方的特殊性学界早有关注,郭浩认为:“在《幼官》篇中,唯有此节的政论部分与玄宫有着直接的关联。”^[23]黎翔凤则认为:“‘玄宫’即幼官之北宫,以北宫为主,故叙述‘九会’之命于此。五宫所叙,北宫独详。玄帝即黑后,余四后皆无命,不奉其命可知矣。主客显然。”^{[21]161}黎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北宫为主”的说法则值得探讨,因为“图方中”也是中心。这里需要进一步厘清“图方中”与“北方”的关系,及其与其他

三方的关系。

从书写特征看,“图方中”和“北方本图”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有严整的次序性和数字叙述。“北方本图”较之其他三方最大的不同就是:文末更多出了所谓的“九会诸侯”和诸侯进奉制度。从“一会”顺次上升到“九会”,从“千里之外”到“三千里之外”,依次叙述进奉制度。这展现了类似“图方中”的次序性,二者产生呼应之势。“图方中”和“北方本图”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虚实之别,具体说来就是“图方中”务虚,“北方本图”务实。前者致力于更为宽泛的大道书写,后者则是具体的朝会政令和制度。

将《幼官》与《逸周书》《礼记》的明堂描写进行对比则会发现:《幼官》“图北方”叙述的“九会诸侯”与《逸周书》《礼记》记载的周公朝诸侯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幼官》暗示的也是天子身份朝会诸侯。胡家聪依据《吕氏春秋》中“齐宣王为大室”的记载,断定此篇为宣王“基于想作统一天下的大君”而为^④,此说有一定道理。无论是否宣王时作,其为统一天下作铺垫的意图是明显的。作为朝会诸侯的建筑,其必然是以坐北的主殿为中心,位于“图北方”的九会诸侯正是这一建筑形态的直观反映。所以,《幼官》“图北方”次中心其实是现实建筑“北主四合形态”的顽强遗留。

“幼官”一词,经何如璋、闻一多、郭沫若等人考辨为“玄宫”,几成定论。“幼官”也就是“玄宫”,玄有黑义,五行方位上属北方^⑤。“图北方”确记载“尚之于玄宫”^{[21]185},所指与“幼官”正合。本篇名为“幼官”,而非“明堂”,其所指主要在北部主殿,正是基于“北主四合形态”而来,是现实建筑样态在理念化过程中的顽强遗留。其创造则在于:凸显主殿地位的同时,配置了其他三面,最终形成“中央+四面”的四合建筑群形态,这一形态仿佛能看到周代宗庙的影子。

综上所述,《幼官》展现出“图方中”和“北方”的双中心模式。前者属总体统摄,后者则是次中心;前者反映的是“四时-四方-五位”系统中中央对四方统摄地位的复归,后者则是现实建筑“北主四合形态”的遗留。建筑、月令、五行的三股合流是在《幼官》中实现的,这也意味着

明堂月令的发生,开启了明堂和月令、五行共生的历程。

其一,它使“五行”与“四时-四方-五位”系统得以融合,实现工整配属。土-五和时节-中、木-春-东、火-夏-南、金-秋-西、水-冬-北,这为月令书写的五行相生典型模式开启了可能和法门。《管子·四时》已经按照东(春、木)—南(夏、火)—中央(土)—西(秋、金)—北(冬、水)的相生次序进行书写,这成为后来《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月令》一脉相承的月令书写模式。

其二,它使明堂实现了现实建筑的理念化、五行化转变。《幼官》中的建筑带有现实建筑“北主四合形态”的遗存,但是“图北方”作为双中心中的次中心,最终统摄于“中央”之下,使得北方与东南西三方平等化,从而使实现四方均等成为可能。在三股合流的背景下,一旦四方均等而形成工整的存在,理念化的明堂也就诞生了。现有文献中最早、最工整的明堂月令出现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其四方和中央被分别命名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太室”,此后所谓的“亞”形明堂才真正出现。

余 论

“四时-四方-五位”系统是悠久而稳固的存在,反映的是古人时空统一的思维认知,五行系统的介入并没有快速融入,根本原因在于五行的产生伴随着“五行勿常胜”的平等理念。《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说在宜。”^[24]³¹⁹孙诒让认为:“言视其生克之宜。”^[24]³¹⁹《孙子兵法·虚实篇》亦有:“五行无常胜。”杜佑云:“五行更王。”^[25]这些凸显的都是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平等属性,“四时-四方-五位”系统中“中央”则表现出与“四方”不同的特殊性,并依据这种特殊性在此系统中和谐共生。五行以其平等属性无法与五位对应,所以,融合过程中势必出现“四时-五行”的失配,以及“土”无处安置的尴尬。

早期建筑系统所展现的北主四合形态同样是悠久而稳固的存在,它曾以主殿为主要所指反映在早期的明堂书写中。从后代典型的明堂看,呈现的都是“中央+四方”的工整“亞”形结

构。从北主四合形态演变为“亞”形结构,首先是在理念中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曾出现过另外一种理念化的建筑形态,那就是山东临淄郎家庄四面屋。出土于此的漆器图案之五,时代约为春秋末战国初。它呈现出工整的四合形态,每面屋舍均呈现外向形态,中央庭院被艺术化处理。显然,这种建筑形态在先秦现实建筑中并不存在。四面屋是理念化工整化的四合结构,它完全具有与“四时-四方-五位”系统相暗合的属性。“在房宇与内外圆之间的空隙,用四鸟、十二只鸡和四株花草填补。鸟勾喙修尾,由此一屋顶跨向另一屋顶;鸡每面三只,呈追逐奔鸣状。”^⑧十二只鸡展现出的动态逐奔、顺时针旋转的情形,完全可以对应四时的轮转。所以,四面屋应该就是悠久的“四时-四方-五位”系统深远影响的产物,二者可以契合互释。

但是,这显然还不是后代“亞”形的明堂。通过对比可知,“亞”形明堂无一例外都有一个位居中央属土的屋室,如《吕氏春秋》有“太室”、《淮南子》有“中宫”、《礼记·月令》有“太室”,四面屋则没有。四面屋和“亞”形明堂表面上的区别是有无中央屋室,其本质区别则是“亞”形所对应的五行系统。四面屋可以很好契合“四时-四方-五位”系统,但是它没有也无法对应五行。这说明五行系统在四面屋那里,其实面临的是与“四时-四方-五位”同样的融合难题,四面屋没有完成建筑、月令和五行的三股合流。

《幼官》完成了三股合流,然而其建筑系统遗留着现实建筑的北主四合形态,而不是直接呈现为四面屋。这一方面说明现实建筑北主四合形态的悠久与稳固;另一方面说明在明堂月令的发生过程中,建筑系统的工整化改造并不是必要前提,五行系统的融入才是关键。

《幼官》实现了“中央土”的统领,完成了五行的融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五行无常胜”理念的突破,其复归的是中央对四方的统领地位。这一突破和复归何以在《幼官》中得以实现?正如康中乾所言:“先秦哲学在性质上是社会政治哲学;其特点是哲学思想围绕社会政治问题来旋转,哲学问题和思想理论从社会政治问题切入和引出。”^[26]与当时的历史政治契机密切相关是《幼官》得以实现突破和复归的原因。

《幼官》大致产生在战国后期趋向统一的时代当是确定的。《幼官》是为一统国家政治作铺垫的,悠久的、具有绝对统摄地位的“中央”被再次复归,在融合五行的过程中突破了五行的均等属性,从而使本篇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得月令书写真正实现了“王官化”改造^⑥。

《幼官》实现的三股合流为后世明堂月令的进一步书写提供了可能和契机。《幼官》突破了“五行无常胜”,但有效融合了五行,展现中央的统领;实现融合后的月令书写才具有进一步书写的可能:《管子·四时》《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月令》等均是五行相生模式进行的月令书写,即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这种模式再次回复了“五行无常胜”,而消解了“中央”的统领地位,也真正实现了明堂的“亚”形结构。无论是《幼官》的中央统领式书写,还是后世典型的相生式书写,无疑都密切关联着政治的目的性。《幼官》在于为君王的一统政治张本;相生式书写则是文士与君王权力之间制衡的产物,一方面宣扬明堂月令依据五行天道而行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则展现出对君王权力的制约和诫劝。关于这一点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做详细论述。

注释

①张小稳就明确将参入了阴阳五行说的明堂月令视为早期月令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不同于以《周书·月令》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参见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②如葛志毅:《明堂月令考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萧放:《明堂与月令关系新证》,《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等等。③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④林甸甸:《先秦月令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⑤大地湾901号房址的形制及其平面图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⑥二里头二号宫殿的形制及其平面图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⑦宫殿的形制及其平面图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⑧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的形制及其平面图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

第5期。⑨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形制及其平面图参见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⑩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⑪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用途性质、形制及其部位称谓图参见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⑫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的形制、用途性质及其位置图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⑬雍城3号宫室平面图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⑭雍城3号五进庭院例外,但可视为四合形态的变形。⑮扶风云塘建筑基址的主殿其结构虽复杂,也并非真正的四合结构,而是左右对称结构。⑯《礼记·明堂位》与《逸周书·明堂解》记载相近。⑰⑱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⑲曹春平:《明堂初探》,《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⑳葛志毅:《明堂月令考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㉑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9期。㉒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之为起源》,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81页。㉓含山玉片的形状及象征内涵参见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式考》,《文物》1989年第4期。㉔转引自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第138页。英文原版见Granham, A. C., *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Singapore, 1986, pp84-90。㉕《尚书》各篇的真伪情况较为复杂,根据葛晓音先生的考证,《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牧誓》《洪范》《康诰》《酒诰》《洛诰》《无逸》《吕刑》《秦誓》《君奭》等篇应是较早的可信作品。葛先生考证可从。参见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㉖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㉗关于五行的排列次序,唐人孔颖达以事物由微而著的发展次序释读,王爱和曾经把各种出现的排列都归纳入相生模式和相克模式,有些牵强。㉘具体形制和说明详见李零:《子弹库帛书》(下册)夹页图版,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㉙㉚“捍蔽”“敷”“极”依李零释读。参见李零:《子弹库帛书》(下册),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㉛关于《幼官》《幼官图》所展现的图纸形态,郭沫若、李零、张固也等人各做过复原,各种形态虽有不同,但都指向文本与图形式结合的思路。㉜《幼官》显然是五行观念的展现,但是并没有明确出现“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名。㉝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㉞《吕氏春秋》中

的四方建筑各有名称,其中北方正是“玄堂”。^⑤出土于临淄郎家庄的漆器图案之五及图案描述,参见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⑥王官政治成为月令书写的核心内容,之前《夏小正》《豳风·七月》《逸周书·时训解》等月令文献都不是以王官政治为主要内容的。

参考文献

- [1] 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903.
- [2]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M]//观堂集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125.
- [3] 杨宽.古史探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4] 钟晓青.秦安大地湾建筑遗址略析[J].文物,2000(5):68.
- [5] 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6] 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李学勤,审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7]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007.
- [8] 陈寿祺,皮锡瑞.五经异义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M].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04.
- [9] 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61.
-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59.
- [11]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文白对照全汉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209.
- [12] 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J].中州学刊,1985(5):99.
- [13] 杨儒宾.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14] 金谷治.五行说的起源[J].哲学译丛,1990(3):61-62.
- [15] 艾兰.“亞”形与殷人宇宙观[J].中国文化,1991(4):32.
- [16] 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47.
- [17]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8.
- [18] 顾颉刚,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53.
- [1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0]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4611.
- [21]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2]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M].北京:中华书局,2019:990.
- [23] 郭浩.管子品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59.
- [24]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5] 曹操,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杨丙安,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158.
- [26] 康中乾.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0.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Mingtang Yueling

Guan Zongchang

Abstract: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solving issues related to the Mingtang (bright hall) and the monthly order is to start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Mingtang Yueling.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flects that the early architectural form of palaces shows “quadrangle with the north hall as the main body” rather than the later typical “亞”-shape. Records of the Mingtang in early texts are precisely a reflec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is architectural form. The occurrence of the “亞”-shaped Mingtang neede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ts architectural system with the Yueling (Monthly Ordinances) system and the Wuxing (Five Phases) system. When the concept of Wuxin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traditional “four seasons–four directions” system, problem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placing the “earth” position and the incongruity in spatiotemporal alignment arose. Moreover, the notion of equality inherent in the mutual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view of Wuxing needed to be aligned and adjusted with the overarching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The initial integration of these three systems was realized in *Youguan of Guan Zi*. By inventing a “Five Harmonies season” situated at the “center”. It achieved the complete incorporation of the Wuxing system into the Yueling system. Through the “Central Diagram”, it restored the “central earth” to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grated Wuxing framework. At the same time, *Youguan* also granted special status to the “Northern Diagram”, forming a unique “dual–center” model that reflects the 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north–main enclosed quadrangle patter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uxing concept was key to driv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Mingtang Yueling. Following its incorporation, the Mingtang was reconfigured into a standardized ceremonial space, and the Yueling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into an official governmental system.

Keywords: Mingtang Yueling; Wuxing system; “亞”- shape; *Youguan of Guan Zi*; genetic approach

[责任编辑/周舟]